

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

——南京菩萨拉贝的故事

● 张纯如



2011年12月11日,张艺谋执导的战争史诗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在京举行首映礼。从《南京!南京!》到《拉贝日记》再到《金陵十三钗》,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!今天我们讲述的,是南京的恩人——约翰·拉贝的故事。

日本人有枪,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袖章

德国商人约翰·拉贝,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他是一名英雄,“南京的活菩萨”。但是对日本人而言,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。因为他不但是—名德国公民——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,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。

在南京暴行之前,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。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,他曾到非洲工作了几年,于1908年来到中国,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,1937年调至南京办事处。

几年后,拉贝变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,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。1938年,他告诉德国听众:“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,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,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。”几十年后,拉贝的外孙女坚持认为,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,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。

当拉贝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,就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,拉贝选择了留下,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。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,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,拉贝依然坚持留下。拉贝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他个人

的安全和幸福,而是建立安全区。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,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。

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时。1937年11月25日,他发电报给阿道夫·希特勒,请求元首“善意地从中调停,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,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”。与此同时,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——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:“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……否则的话,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。希特勒万岁!拉贝——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。”

希特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,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。他发电报之前,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;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,像军事学校、临时机场、兵工厂和军火库等。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,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,可怕的形势很快到来。

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,他写道:“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——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。骤然间,整座山置身火海……”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:“紫金焚则金陵灭。”

拉贝不断地给日本使馆写信,要求制止日军的暴行,但这一切似乎无济于事,在安全区外,新的暴行每天都在不断出现。于是,拉贝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: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,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。

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,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,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——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、妻子或女儿。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。一到那儿,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,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。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。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:“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,而我……只有纳粹

党标志和我的袖章。”

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。在街道上,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,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,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。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——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,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。而同时,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,上面写着:“回到家乡来 给你饭吃 信赖日本军!可得救助!”

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,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,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,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。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,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。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,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她们赶走,这种情况太频繁了,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,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,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。

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,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。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,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。每个新生儿都会收到一份礼物:男孩10美元,女孩9.5美元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,当男孩子出生时,便取名叫拉贝;如果是女孩子呢,就用他妻子的名字,叫多拉。

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,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的心,美国人罗伯特·威尔逊大夫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:“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……有着一颗充满仁爱的心,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‘德国元首’的尊崇结合起来。”

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

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拉贝等人在南京的事迹,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遇。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,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,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,有人甚至绝

望地自杀。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。

在被召回德国之前,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,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,并试图会见赫尔曼·戈林甚至阿道夫·希特勒。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向日本政府施压,以阻止这场屠杀。1938年2月,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,拉贝带着约翰·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。

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,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。通过不停演说和反复播映约翰·马吉拍摄的胶片,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。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,6月8日,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,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。

但是,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,他就大错特错了。几天后,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。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。后来,西门子公司的卡尔·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,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。这样,他才被释放出来。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、谈论和写作,更重要的,不得将南京暴行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。

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。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,因为他的纳粹背景,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。首先,他被苏联人逮捕,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。然后,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,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,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“非纳粹化”的过程中。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,在这期间,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,耗尽了积蓄和精力。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,忍受着饥饿和寒冷,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,以换取豆子、面包和肥皂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,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。

在南京,拉贝是一个传奇,而在德国,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。

《拉贝日记》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

那时的精神状态。昨天,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。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,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,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,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,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。我还要请求……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,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。我必须斗争——可我太累了。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。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,我不会加入国社党……在南京,对于数十万人来说,我是“菩萨”,可在这里,我是“贱民”,是无家可归的人。

1946年6月3日,拉贝的纳粹罪名终于得到了免除,精神的折磨总算有了尽头,可拉贝一家的生活依然十分艰难。

1948年,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。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,几天之内,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,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——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。当年3月,南京市市长来到瑞士,购买了大量的奶粉、香肠、茶叶、咖啡、牛肉、黄油和果酱,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。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,拉贝一家采集野菜,煮成汤让孩子们吃,大人则凭着一干面包维持生命。

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,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,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。国民党政府还指出,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,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。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,拉贝也在信中说,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。

两年后,拉贝死于中风。去世前,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,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,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、排序和装订,甚至还有图片说明。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,这份珍贵的《拉贝日记》才为世人所知。